

周口红色记忆

宣传报道总策划:王健

致敬烽火中的她们

战争是残酷的,然而烽火硝烟中,依然可见无数女性的身影。她们用羸弱的身躯,扛起民族解放与复兴的重任,铸就了女性最刚毅的丰碑。向警

予、赵一曼、刘胡兰、江姐……她们的名字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中,为国人敬仰。在我们豫东大地上,也有一批这样的女性,值得尊敬与缅怀。

曾克:向刘邓首长“请战”



故事背景

曾克,1917年出生于周口市太康县。1935年,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;1938年,出版报告文学《在汤阴火线》;1940年冬,在周恩来帮助下从重庆奔赴延安;1942年,受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,聆听毛主席讲话。1945年,她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,成为新华社随军记者。

1945年7月下旬的一个傍晚,曾克来到野战军政治部驻地,遇到了刘伯承司令员。还没等她报出姓名,刘伯承就认出了她。“稍息吧,记者同志!”司令员说,“难得有这样安静的黄昏,你一个人在构思啥子呀?”“报告司令员!这是我的申请书,烦请您转交党委考虑,批准我随部队南征吧!”曾克向司令员说出憋在心里的委屈,并递上一份申请书。

“走,咱们一块儿去政治部,把你的请求亲自告诉张际春副政委。”刘伯承接过申请书说。

见到张际春副政委,刘伯承开门见山地说:“际春同志,记者同志向你请战了!”

正在小油灯下批阅文件的张际春听到刘伯承的声音,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刘伯承将曾克的申请书递到他手中,张际春当即看

了一遍。“报告副政委,我已经连着两个晚上下定决心来找您,请不要把我送回后方,不要剥夺我参加战略进攻的权利!”曾克又一次激动地开口。

“说得好!这些问题,张副政委都会给你满意的答复。你忘了,战士是不用眼泪求战的!”刘伯承风趣地说。

“组织上考虑你已是做妈妈的人,身体瘦弱。”张际春解释说,“我们需要保存力量,前后方都需要文化战士,所以才想把你留下来。”

“请用对一名普通战士的要求来要求我!我保证不让部队背上包袱!”曾克语气坚定。

“那就特殊处理一下吧,际春同志!”刘伯承先表了态。

听了刘伯承的建议,张际春立即给邓小平政委打电话。

“完全同意特殊处理,列入战斗人员编制!”邓小平给了明确答复。

曾克强忍激动的泪水,告别首长,连夜做起出发的准备。

到达大别山后,在岳西县的半年时间里,曾克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,带领群众斗地主、分田地。敌人用残暴的手段疯狂报复,曾克和同志们天天都在进行殊死斗争。常常是忙活了一天,别人休息了,她又在如豆的灯光下伏案疾书,记录下那些感人的故事,唯恐它们被遗忘。

这段戎马倥偬的岁月里,她记录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,如《一个老英雄的决心》《送别》《把钱挂在瓜棚里》《船家娘》《陈锡联司令员会见了妈妈》《铁树开了花》等。这些故事后来集结为著名的报告文学集《挺进大别山》。

1949年9月,曾克有幸作为以刘伯承为团长的第二野战军代表团成员,参加了一届政治协商会议。同年10月1日,曾克登上天安门城楼,亲历并拍摄了开国大典。那一日,天安门城楼上摄影记者仅5人,曾克便是其中之一。

樊西曼:新四军中女“金刚”



故事背景

樊西曼,1915年出生于河南淮阳,原名樊淑俊,家境贫寒。求学期间,她开始接触并接受新思想。1936年,她奔赴北平上大学,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,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。

1937年,卢沟桥事变爆发,她前往北平西山地区,组织游击武装抗击日寇。

1937年9月,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(简称老八团)组建。经党组织推荐,樊西曼等四位女同志先后来到这支部队,被分配在团政治处工作,战士们称其为“四朵金花”。

同年12月,豫西南地主武装趁老八团主力外出执行任务,对团部所在地发动突然袭击。樊西曼和留守的干部战士迅速拿起武器还击。从拂晓到午后,她和战友们死守阵地,为主力回援争取了宝贵时间。最终,部队火速赶回,一举击溃敌人。

团首长表扬了樊西曼等四位女战士,称赞她们“带着一股子男子汉才会有的阳刚之气,就是老八路的‘四大金刚’”。

漫漫征途,樊西曼背负着重重的行囊——背包、米袋、枪支与弹药,随大部队的山涉水。她还承担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。在宿营地,樊西曼和伙伴们在村口搭起

简易舞台,演出的剧目《放下你的鞭子》成了最受战士和老乡欢迎的节目。樊西曼担任主角,饰演路见不平一声吼的青年工人“大老李”。一次,演到高潮部分,当“卖艺老汉”因饥饿无力表演而遭鞭打时,扮演“大老李”的樊西曼怒不可遏,一个箭步冲上台,对着台下振臂高呼:“住手!别打了!中国人不打中国人!有本事,咱们就打日本鬼子去!”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激昂的口号声。从此,“老李哥”的名号不胫而走。

1940年春,樊西曼被任命为盱眙县(现属江苏)县委委员、组织部部长。

此时,樊西曼身怀六甲。一次下乡调研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她突然腹中蠕动,不禁皱起眉头。同伴杨寒见状紧张地问:“姐,是不是要生了?”樊西曼说:“可能吧,预产期已经过了。”杨寒抱怨道:“姐,你不要命啦,多危险啊。”情况紧急,杨寒只好将她安置在一户可靠的农民家中生产。

孩子出生后,樊西曼又急着返回工作岗位。杨寒劝不住她,便说:“你休息几天可以出去工作,但孩子不行啊,还没满月,怎么能抱着到处跑呢?你要出去我拦不住,孩子就留下,我一定照顾好。”樊西曼只好把孩子留下,寄养在永丰乡一位基层干部家中。三年后,她才将孩子接回身边。老乡们都说:“樊大姐真是拼出命来工作,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。”

1943年,樊西曼离开盱眙,先后担任天长、和含(和县、含山)、江全(江浦、全椒)等县县委组织部部长。定远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,她又担任中心区委书记。

在此期间,面对日寇、伪军、国民党顽固派三方势力勾结、“扫荡”频繁的险恶局面,她沉着应对,亲手击毙企图叛变投敌、危害地下党组织的叛徒。她常常只身一人,怀揣驳壳枪,深入敌伪据点周边乃至“拉锯”地区开展工作,建立秘密交通站,发展党员,搜集情报。乡亲们无不称赞她胆识过人,胜过“穆桂英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樊西曼曾任上海铁路局副局长。周恩来总理称其为“中国铁路系统的第一位女局长”。

故事背景

丁林,1918年出生于河南睢县。1939年,她参加新四军。在部队,她苦练枪法,成为小有名气的“双枪女将”。1945年8月15日,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47年,刘邓大军挺进中原。鹿邑县城解放后,我民主政府决定开辟试量新区。同年3月,丁林带着3名男同志、5支枪来到试量。经过几个月的工作,中共试量区政权建立,丁林任区长。

试量联保主任丁太昌思想进步,经争取,开始为我党工作。一天,县保安团突然出动,直扑丁太昌家,烧毁房屋,并将其父母、弟妹等5名亲属抓到县城,扬言如果丁太昌不“悔改”,就杀其全家。

危急关头,丁林果断出手。她率领区队一举抓获13名县保安团头目的亲属。丁林放出消息:以这13人交换丁太昌的家人。权衡利弊后,县保安团只得放人。

面对敌人的猖狂,丁林毫不示弱,在大会小会上公开宣告“姑奶奶我不是好惹的”,誓与敌人斗争到底。

1947年夏,麦收刚过,丁林带着区队队



员到碾李村收公粮。公粮暂时放在一处群众院子里,其他队员到邻村继续收粮,丁林独自一人看护粮食。突然,十几个敌人前来抢粮。丁林迅速抢占有利地形,双手持枪沉着应战。附近的区队队员听到枪声急忙支援,敌人顾不上抢粮,仓皇逃窜。

这一仗之后,许多老百姓称丁林为“双枪女八路”,纷纷感叹:“这姑奶奶,真不是好惹的!”丁林的名声传开了。

同年秋,丁林调到淮阳新站区任区委书记。当时,新站镇王潭庄有一股匪徒盘踞多日。一天,群众报信:匪首王备臣一伙正在村里夜宿。丁林马上率区队夜袭王潭庄。当他们包围土匪住所时,匪徒还在梦中。丁林第

一个冲进屋里,将匪首摁在床上,缴获了他的武器。其他队员紧随其后,将11名顽匪全部俘获。

另一次,区委在黄花园开会期间,突遭20多名土匪包围院落。丁林手持双枪率先冲出,击毙门口一名土匪,又敏捷地打倒另外两名土匪。遭遇战中,区队仅两人受伤,共俘获土匪17名,击毙3人。

在剿匪反霸斗争中,丁林表现出色,被豫皖苏二地委、二分区授予“剿匪英雄”称号。有人说她双手使枪,指哪打哪,是神枪手;有人说她能日行千里、夜行八百,长了一双飞毛腿;甚至还有人说她七天七夜不用睡觉、刀枪不入……

多年后,丁林向子女解释说,日行千里、夜行八百、刀枪不入,当然是神话。但为了战斗,她曾连着翻过十几道墙头,倒是真的;枪法好,双手持枪摆倒敌人,也是真的。

传奇的背后,是沉重的代价。1939年,丁林与中共党员王法瀛结婚。残酷的战争中,他们先后失去三个孩子。1946年,王法瀛壮烈牺牲。1947年,丁林与豫皖苏二地委委员区委书记闫同兴结婚。他们将孩子寄养在淮阳新站的一位老乡家里。敌人早就对丁林恨之入骨,不仅杀害了老乡夫妇,还将孩子摔死在石碾上。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,她先后失去了四个孩子和一个丈夫。

王国英:巾帼亦能卫国



故事背景

王国英,1920年1月出生于西华县道遥镇。父亲怀着“巾帼亦能卫国”的期许,为她取名“国英”。1937年,她参加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,后编入新四军四师,转战江淮大地。

1941年夏初,部队紧急转移。王国英的旧伤感染化脓,战友们将她送进战地医院。医生检查后表示“必须立即开刀”,但当时不仅没有麻药、止痛药,连止血药都缺乏。

无奈,医生用麻绳将王国英绑在门板上,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,进行了三次手术。剧烈的疼痛让她昏迷了一天一夜。医生以为她挺不过去了,提前为她备了一口薄棺。

王国英的丈夫刘朝中闻讯,连夜赶到医院。他握着王国英的手,在床边守候到天亮。医务人员都红了眼眶,既为王国英的病情揪心,也为刘朝中的深情动容。又过了一天,王国英仍未苏醒,医生委婉地表示“希望渺茫”。

或许是命运不忍辜负这份深情,王国英竟奇迹般地醒了过来。她一睁眼,看到的便是刘朝中满是泪水的双眸。刘朝中见她苏醒,不禁破涕为笑,一脚踢开那口置于一旁的薄棺,大喊:“她醒了!她醒了!”

1942年年底,一批伤员急需紧急转移到洪泽湖隐蔽。当时,刘朝中任后方医院教导员,王国英任医务所指导员。夫妻二人带着轻伤员乘一条船躲进芦苇荡。

一天傍晚,县委干部带来三个自称“上海来的抗日积极分子”的年轻人,要求一同乘船。起航不久,船舱里突然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。

刘朝中立即走进船舱查看,质问是谁开的枪。一个年轻人辩称“不小心枪走火了”。刘朝中严厉告诫:“你要知道这样会暴露我们,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情况!”夜深了,同志们渐感困倦,纷纷合眼休息,刘朝中也靠着船舱睡着了。

王国英没有睡。她觉得那三个青年举止反常。她有意躺在那名开枪的青年身边,假装睡着。半夜一点多,她感觉到那青年悄悄起身,还试探性地推了自己几下。王国英假装熟睡,一动不动。那人见她“睡熟”,便点燃一盏用墨水瓶自制的小煤油灯,掏出一本小本子,用大棉袄蒙住头,匆

赵海静:身怀六甲慷慨赴死



故事背景

赵海静,1923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。她15岁成为抗日军政教导大队的宣传员;18岁担任中共湖北省安陆县一个区的区委书记。1946年,她来到高水县开展革命工作。

1947年12月,赵海静担任中共鄂西高水县妇联主任,负责宣传党的土改政策,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斗争。这时,赵海静历经十年革命洗礼,经验丰富。

1948年4月23日,赵海静和其他土改工作队员早早来到陈洋台村,召开土改大会。会议正至高潮,侦察员跑来报告:“返乡团”正朝会场扑来。赵海静立即组织部分队员掩护群众疏散,随后与战友李德龙、刘福全一起向沙河岸边撤退。

此时,赵海静已怀有身孕。后撤一段路后,她愈发感到行动不便。情急之下,李德龙和刘福全轮番背着她撤退。敌人发疯似的追了上来。眼看他们即将

被包围,赵海静环视四周,发现只有渡河北面的沙河,才有可能突围。

赵海静命令李德龙、刘福全立即向河边撤退。李德龙和刘福全舍不得战友,执意要背着她一起突围。

敌人越来越近,赵海静来不及多说,举起枪指着李德龙、刘福全,说:“再这样

下去,咱们谁也走不了!我喊一二三,你们立即朝沙河突围。党员花名册和重要文件交给你们,你们冲出去后把它交给党组织!”

李德龙、刘福全仍不肯走。赵海静厉声命令,甚至以自杀相威胁,两人才含泪向沙河奔去。为掩护他们突围,赵海静开枪吸引敌人火力。子弹打光后,她不幸落入敌手。

李德龙、刘福全成功突围,远远回望赵海静被捕的身影,心如刀割。

被捕后,敌人对赵海静严刑拷打,她毫不畏惧、坚贞不屈。

残暴的敌人把赵海静拖到5里外的杨柳村北门,乱枪射杀。

年仅25岁的赵海静牺牲了,连同她还未出生的孩子。

赵海静牺牲后,邓城周庄村的村主任带领几名地下党员,趁夜色找到她的遗体,连夜将她埋葬在周庄村西头的田地里。

赵海静带着未出生的孩子,慷慨赴死,如同一座丰碑,永远耸立在人们心中。